

澳門華文小說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

余少君

[摘要] 澳門文學的作家及作品，自1980年代“澳門文學的形象”口號誕生後，已呈一片片的波浪，而有關澳門現代華文小說的研究，也隨着這股海浪展演開來。近三十年的澳門華文小說研究，有被收錄在專書上的、有被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、也有學術著作的出版，它們主要以宏觀及微觀的論述為討論方向。前者是文學或小說發展的概述，按照時間的順序陳列出來，勾勒出澳門小說的輪廓；後者是針對小說的題材、表現手法及反思等作為批評的視角。然而，研究作品的篇幅看似不少，唯具有理論性的文本討論仍是欠缺，反映出澳門小說研究的局限性。

[關鍵詞] 澳門 文學 小說 華文文學 澳門文學

一、前言

澳門文學的作家及作品，自1980年代“澳門文學的形象”口號誕生後，已呈一片片的波浪，湧進小城的海岸上。另一方面，文學評論也嶄露頭角。其中有關澳門現代華文小說的研究，也隨着這股海浪展演開來。

有關澳門現代小說的評論，有些是被收錄在專書及發表在文學雜誌上，如胡培周的〈澳門的小說〉、鄒家禮的〈澳門小說的未來——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、廖子馨的〈試評周桐的《錯愛》〉、〈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——評柳惠《白狼》〉、鍾偉民的〈被詛咒的愛情和詩——關於長篇小說《抒情調的終止》〉、林玉鳳的〈寂然小說敘事角度淺論〉、陶里的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——澳門短篇小說選代序〉、朱雙一的〈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〉以及何香萍的〈對現代校園生活的抒情與開拓——評林中英的《青春快板》〉等等。同時，更有以澳門現代小說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，如湯梅笑的《澳門敘事》、何香萍的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——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等。

陶里認為，澳門的小說是“隨着八十年代澳門文學的蓬勃發展而發展起來”的，^①然而它首先是建立在1950年代由愛國人士主持的《新園地》之上，該刊同時也刊登短篇小說，這是澳門的短篇小說“開始進入它的新時期”。^②

作者簡介：余少君，台灣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①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：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9頁。

②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：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9頁。

到了1960、70年代，澳門作家除了在澳門發表之外，還把作品寄到香港發表。如凌鈍在90年代出版的《澳門離岸文學拾遺》裏，則收錄了不少澳門作家發表在香港的小說。其中，如江映瀾以低層生活為創作基調的作品，陶里認為成就是最高的，其文字充滿了對於人性的關懷。^①

1980年代以降，澳門小說的發展持續蓬勃。如陶里雖以現代詩著稱，但也有小說的作品呈現，如〈安萬達夫婦的遭遇〉、〈石卵之戀〉等，一些以寫散文為主的女作家如林中英、廖子馨等也有〈重生〉、《奧戈的幻覺世界》等小說創作。寂然與梁淑淇是後起之秀的代表，他們以小說的創作為主，如寂然有《月黑風高》、《撫摸》、《救命》；梁淑淇有《小心愛》、《我和我的……》、《陽光最是明媚》等的小說問世。

在進入21世紀，張堂錡指出，澳門現代文學也出現了“新移民書寫”，以及“博彩或歷史題材”等的創作。特別在小說的題材方面，隨着政治及經濟的轉型，內容上更將居民的生活情節放置在文字之中，如鄧曉炯〈轉運〉、李宇樑《上帝之眼》、周家樂的〈賭徒〉及太皮的《綠氈上的囚徒》、《懦弱》等。^②

二、宏觀的文學史論述視角

目前，澳門現代小說的研究，主要分成以宏觀的文學史論述，以及微觀的作品討論兩大類型。前者是指研究者一般按照時間的順序，將澳門小說作家及作品的類型，以概述的形式呈現。這些篇章比較偏向史料的整理，對於澳門文學的研究，提供了完整的發展脈絡。

如胡培周的〈澳門的小說〉。作者以小說的形式作為討論的主軸，分別以“短篇小說”及“連載小說”兩部分來談。首先，他談及短篇小說是以《新園地》、《澳門學生》這兩份刊物為主要的發表園地。到了50年代末，《澳門學生》刊登了長達三千字的短篇小說，讓澳門報刊走向多元化。到了60年代初期，文藝刊物《紅豆》也有刊登短篇小說的作品，《澳門日報》的副刊《新園地》也曾登載短篇小說。

至於連載小說，他指出早在抗戰期間，澳門的報刊已有連載小說。如《澳門日報》的《小說》版，可謂提供了重要的發表平台。其中，作家魯茂在該報刊登連載小說《白狼》，另有周桐的《八妹手記》及《逃妻》等。^③

內容方面，緣源在〈澳門文學現狀窺探〉裏提到，澳門的小說創作主要有“長篇連載小說”及“微型小說”。小說的題材多數以“澳門社會現實”為主，一是“表現都市人，特別是較低層人物的生活處境和心理狀態，二是表現大陸新移民或偷渡客的生活情景，因而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地方色彩”。在創作方面，則注意“在流動和交錯的生活中表現人物的心境”，揭示“人物內在心理的困惑，透視不同處境中的人生”。^④

在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——澳門短篇小說選代序〉中，陶里提出早年因澳門文學的傳播渠道不多，於是部分澳門作家投稿至香港的文學雜誌上。^⑤凌鈍在《澳門離岸文學：代序》指出，如

①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：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0頁。

② 張堂錡：〈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〉，宋如珊、魏美玲編：《2010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》，台北：中國現代文學學會，2010年，第416頁。

③ 胡培周：〈澳門的小說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68頁。

④ 緣源：〈澳門文學現狀窺探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101頁。

⑤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：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3頁。

周桐曾於1960年代，因感到“澳門太小，如寫到澳門的報章，不獲刊登，讓熟人知道了，面子過不去。因此，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投到香港《新晚報》去的。”另有李艷芳也在同一時期投稿到香港的《文藝世紀》，其他的有汪浩瀚、江思揚、韓牧的作品也是如此，陶里在定居澳門之前，大量作品也是在香港發表的。^①

鄭煒明在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澳門華文文學〉裏也提到張錚的小說《萬木春》。該書由香港朝陽出版社付梓，是一部以“澳門炮竹工人的悲苦生活為主題”的小說。評論者指出，這部長篇小說一直被澳門文學界所忽視，就算在小城可以購買，但知道的人依然不多，更勿論有討論的蹤跡了。至於該小說的重要性，一是“它保存了許多可參考的五、六十年代澳門社會的史料，如澳門的炮竹業等等的一手資料”，二是“它是我們能掌握的第一部已結集出版，更是以澳門為主題的中文白話文小說”。因此“這書在澳門文學史上，應佔一席位”的。^②

從這些研究的論述得知，澳門文學的發展與文學傳播的場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連。早在1980年代以前，報紙的專欄是文學的傳播重鎮。此外，澳門作家的作品，除了在香港的文學雜誌發表之外，更有在香港出版著作的蹤跡，如張錚的《萬木春》及陶里小說集《百慕她的誘惑》等，可謂窺知港澳之間文學傳播的脈絡。

除了香港之外，自1980年代開始，澳門東亞大學（澳門大學的前身）也是文學的重要發祥地。鄭煒明在上述的論文裏提及，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，“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了澳門歷史上第一套文學作品集，《澳門文學創作叢書》，共有五冊，由當時東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雲惟利博士（筆名雲力）主編，包括了韓牧的詩集《伶仃洋》、雲力的詩集《大漠集》、葦鳴等的詩合集《雙子葉》、散文合集《三弦》和短篇小說合集《心霧》等”。^③雲惟利也在〈十年來之澳門文學〉裏指出，澳門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便是《心霧》，而作者為東亞大學的師生，一共五人全都是來自香港。其中，“《生之夢》和《心霧》是以澳門為故事背景”所寫下的故事。但雲氏強調，這些小說“並沒有那一篇志在反映社會現實”的，他們都是以“小說為藝術”出發，^④可見這是一種對於純文學的追求、創作手法的實驗。

在討論小說的發展歷史之外，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是研究的主題，也能得知澳門小說是如何進行形式上的實驗。如陶里談及小說集《百慕她的誘惑》時，他指出其表現手法，是“超現實主義和魔幻寫實主義結合的短篇小說”，它的題材“來自現實，但其中情節並非現實所能有，甚至不可思議。作者在作品之中設置許多懸疑（不是偵探小說的那一種）留下許多空白，讓讀者去思考或尋找答案，但答案又因人而異，不可能一致”。^⑤可見當時的澳門小說，除了繼承傳統的現實主義表現之外，也有嘗試現代主義的手法，打破了過去小說的固有表現方式。

三、微觀的作品討論視角

澳門現代小說的研究，除了以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作概述外，還有研究或評論者，是以作品為

① 凌鈺：《澳門離岸文學：代序》，凌鈺編：《澳門離岸文學拾遺》上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5年，第2頁。

② 鄭煒明：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澳門華文文學〉，《行政》（澳門）1995年總第29期，第642頁。

③ 鄭煒明：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澳門華文文學〉，《行政》（澳門）1995年總第29期，第628頁。

④ 雲惟利：〈十年來之澳門文學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124頁。

⑤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：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4頁。

討論的對象。這個部分可分成兩大類型討論，一是從小說的題材為討論的重心，從而帶出澳門小說的內容特色，二是從小說的表現手法為研究的主題。這些針對小說形式的討論，幫助我們更深入瞭解文本的自身，以及它與作者及社會之間的關連性。

（一）以反映人情，社會狀況為主的小說題材

廖子馨雖以散文著稱，然而對於澳門小說的研究，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如在〈試評周桐的《錯愛》〉中，她以“創作藝術”為討論的脈絡，分別以“作品的取材角度”、“情節緊湊富懸念”及“生活中的人物李懷民”為研究焦點。《錯愛》對於評論者來說，“是一部十分通俗的奇情小說”，特別從小說人物的描寫得知，周桐是試圖“探討一些人的雙重性格問題，譬如關於愛，尤其好人表現的愛的無私和自私”。然而，評論者的使命，除了為讀者將內容的精粹加以論述外，對於作品更要有一定的批評及反思。她以“藝術缺陷”為該小說的評論作出總結，分別以“到處泛濫的愛”及“創作土壤箝制作品生命力”作為批評的視角。對於前者，她提出結局是“皆大歡喜型”。然而在“整部作品洋溢的愛”的情況下，廖子馨則略嫌“故事情節的安排過於戲劇化”，導致作品“缺乏真實的力量，因而降低作品的感人程度”。至於該小說，何以“創作土壤箝制作品生命力”呢？廖子馨認為，“作為消遣的通俗小說，《錯愛》具有不俗的特色”，然而“因為過份講求故事性卻影響了作品的深度”，以及“忽略對人物內心世界作有份量的刻劃，多流於表面化描述”。^①

從這裏得知，評論者是以故事情節及人物性格為研究的視角，這無疑是小說研究的進步。

除了針對作品的故事論述外，她在另一篇〈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——評柳惠《白狼》〉中，也談到作家與作品存在着相互影響的關係。其中，柳惠即是魯茂，《白狼》是他的代表作。

《白狼》是魯茂1980年代的作品。陶里指出，其內容是描寫“澳葡高官私生子黃白朗成為黑社會份子，為非作歹，雖犯案而得到庇護，並與北地南來的婊子鬼混的故事”，而作品揭發了“澳門地區官匪勾結的醜陋行徑，但作品後半部離開原來意圖，讓白朗在獄中被黑幫陷害而覺悟，改邪歸正”。因此，這是一部“觸及澳門葡人生活的小說”，而魯茂是拓荒者中的佼佼者。^②

在廖子馨的眼中，這是一部“勸人從善”的作品，也可以說，作家是以“勸人從善”為創作的宗旨。她提到，“這與作者的個性、人生觀、創作觀有一定的關係”，因他除了是作家之外，也是教育工作者。因此，他是“懷着極重的社會責任感進行創作”。最後，廖子馨帶出創作環境自由的重要性，因為在社會的長期思想束縛下，作者對於作品難以有所突破，也是澳門小說創作“所面臨的最主要困境”。^③

周桐在〈我的小說創作歷程〉也提到，“澳門因地方小的關係會使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束縛很多，連編輯亦有顧慮”。她說：“曾經想寫一個以醫院為背景的故事，主角是一名離婚的女醫生，故事的人物有本澳名流，情節中且有兒童受虐待”。儘管她也明白，“所有的人物與情節全是虛構的，但澳門只得兩間醫院，這個故事寫出來，甲醫院可能認為你寫它，乙醫院亦認為你影射它；假若再有名流對號入座，麻煩就會更多。因此這個故事一直未有向編輯提出過，因為我相信在創作的時候一定會遇到很多煩惱”。^④

① 廖子馨：〈試評周桐的《錯愛》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200頁。

②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：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4頁。

③ 廖子馨：〈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——評柳惠《白狼》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208頁。

④ 周桐：〈我的小說創作歷程〉，《澳門文學論集》，澳門：澳門文化學會，1988年，第60頁。

另一方面，以女性為題材的小說，也紛紛出現在澳門文學的領域中。除了周桐的《錯愛》外，也有林中英的短篇小說集《雲和月》，這是一部由十二個短篇小說而成的作品，大部分內容都是“以一個女性的角度，將工商業化的城市生活中凡人小事——特別是男女戀愛、婚姻、家庭、人與人之間的複雜而無奈的關係寫成故事”，如〈愛的夢魘〉、〈小夫妻〉、〈結婚三周年紀念〉、〈擠提後〉、〈失業〉、〈老王退休〉等。^①

廖子馨在《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》一書中認為，林中英“喜以清麗的筆調”描述屬於女人的故事，說她們的“苦惱和歡樂”、她們在“事業與家庭間的抉擇和掙扎”、揭示作為女人所要“承受的壓力和付出的代價”。^②

當現在小說走進21世紀，張堂錡在〈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〉裏提及，隨着賭權的開放和成為小城的經濟重心，也對文學有所影響，以博彩業為題材的小說逐漸登上了澳門文學的舞台。如鄧曉炯〈轉運〉，李宇樑《上帝之眼》、周家樂的〈賭徒〉等。作者針對小說的內容，指出“也許是司空見慣，澳門作家對博彩題材的關心不足；過於強調結局、忽略過程細節鋪陳的寫作窠臼，使這類題材作品整體力道也稍嫌薄弱”。^③不過，即使澳門小說，以博彩為題材的並不多，但也正是澳門文學的重要特色之一。如在小說家寂然的眼中，他認為博彩業的題材，更是小說家用心經營的表現手法，“寫出各種記錄社會變遷與人心變化的作品”，“皆從不同角度描寫澳門人，特別是年輕人面對社會巨大轉變時的遭遇和反應”。因此，這些小說也反映了澳門真實的社會背後，以及居民的生活場景。^④

至於1990年代發跡的梁淑淇，於千禧年後出版的小說，依然是以討論人情之間的内容為主。如她在2011年出版的小說《我和我的……》，是以描寫宋知悅、楊奕熙及程佑之間的愛情為故事的主軸。當然，尋找“自我”才是該小說的命題，而那個“自我”的追尋，是以女性的視角去觀看的，像女主角宋知悅一直在小說中尋找自我，從身世、感情到生活的意義。在故事的尾聲，她毅然結束祖父遺留下來的咖啡館，決心放下沉重的人生包袱。最後，她重新尋找新的情感寄託，用新的心態延續了她未知的身世，延續她一直追尋以及追問的那個“我”。^⑤

（二）以小說的表現手法為討論對象

除了討論小說的題材外，表現手法也是研究者的主題。林玉鳳在〈寂然小說敘事角度淺論〉一文中，以“敘事角度的實驗”為研究的主軸，並認為寂然以“改變小說敘述者為被敘述者”及“改變敘述角度干擾情節發展”兩大手法，將小說呈現在讀者的眼前。

前者方面，寂然分別在和林中英的小說合集《一對一》及《月黑風高》中，試圖“轉移、改變和扭曲原有的敘述角度，使小說的敘述者變成被敘述者”。後者方面，她認為寂然是“擅於透過改變敘述角度來打破傳統小說的情節發展路線的”。以《月黑風高》為例，作者“在敘述舒飛等人的故事的同時，也在敘述着一個小說作者在創作小說的故事”，因此，林玉鳳指出，它“是

① 鄭煒明：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澳門華文文學〉，《行政》（澳門）1995年總第29期，第642—643頁。

② 廖子馨：《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》，澳門：澳門日報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48頁。

③ 張堂錡：〈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〉，宋如珊、魏美玲編：《2010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》，台北：中國現代文學學會，2010年，第416頁。

④ 寂然：〈俯瞰賭城的悲情——讀李宇樑《上帝之眼》〉，《文訊》（台灣）2016年總第367期。

⑤ 余少君：〈一切歸於“我”的姓名——讀澳門作家梁淑淇《我和我的……》〉，《文訊》（台灣）2016年總第367期。

一個有多重結構，多個主題的小說。”^①

朱雙一在〈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〉中提到在實驗小說裏，以梯亞及寂然最值得令人注意。他指出，梯亞的〈第八天的早晨〉、〈鋼門〉等，與陶里的《百慕她的誘惑》一樣均是採用了魔幻寫實的手法。至於寂然，他的《月黑風高》、《撫摸》等書“既有質疑媒體真實性的後設旨趣，又有通過包括‘同性戀’在內的各類題材對人性的深刻發掘，更有對社會治安、黑幫勢力等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揭示，顯示作者的勇氣”。^② 這股勇氣是出於作者對於生活場景的思考，以及對於創作的一份執着吧。

那麼小說家的自身，有沒有反思澳門小說的發展問題？鄒家禮（即寂然本人）在〈澳門小說的未來——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中，試圖以小說家的身份，透過文學社會學的視角，討論澳門小說的未來發展。全文分別以“讀者的問題”、“作者的問題”、“文學市場由小說開始”及“小說教育”等開展，讓研究者思考小說的傳播與影響的阻力。

以創作者的身份探討文本的自身及影響，想必會有另一番的說服力，因為他們對於文學發展的走向會有深刻或深沉的體會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寂然特別提到“作者的問題”，這應是研究者難以窺知之秘：“作為澳門的其中一個小說作者，我自以為明白此間寫作人的心態，他們一方面自滿於目前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卻不想接受對外投稿可能面對的挫折。我甚至見過有幾篇小小說刊登在《澳門日報》便自以為是大作家的井底之蛙。更可悲的是，井底之蛙正有年輕化的趨向。”除此之外，他還提到小說的教育。一是“讀小說的教育”，其次是“寫小說的教育”。首先，他開宗明義批評，澳門小說之所以缺乏讀者，其實是因為“澳門的教育機構向來對小說閱讀的培養不夠重視”，從而使澳門的讀者“眼光之偏狹”。同時，澳門的作者和讀者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低”、亦“非常安於現狀”，於是，他強調“閱讀小說的教育”的重要性。再者，對於目前的小說家發展，寂然也給予我們當頭棒喝：“在本澳普遍利字當頭的教育之下，愛文學，愛寫小說，根本就被視為死路一條。加上在本澳寫小說難以獲得理想的報酬和重視，是以許多本來頗有潛質的新作者，始終不能堅持下去，多數是輟筆不寫，或者極之偶然才寫一兩篇。”^③

寂然還指出，倘若小說家所談及的困境在未來的文學發展依然停滯不前的話，那麼小說無論是使用怎麼題材或採用何種手法，即使再有大量的研究著作，澳門小說的發展空間還是相當狹隘的。文學對於在地的影響依舊薄弱，或從他者的區域觀看，小城仍是一塊沒有文化的“文化沙漠”。因是之故，我們又應如何定位澳門的小說？又應如何打破這些重重的困境呢？

除了單篇的小說研究著作外，更有針對澳門小說的學術專著，如湯梅笑的《澳門敘事》，以及何香萍的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——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等。

前者出自湯梅笑的碩士論文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——澳門小說的文化品格與敘事範式》，在該論文的最後部分，作者以澳門小說創作的困境為題收結。她坦言，澳門小說的藝術水平參差不齊，作者純粹“憑熱情參與創作”，欠缺文學的訓練。有些的作品則在報章進行連

① 林玉鳳：〈寂然小說敘事角度淺論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219頁。

② 朱雙一：〈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〉，《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》，澳門：澳門日報出版社，2002年，246—247頁。

③ 鄒家禮：〈澳門小說的未來——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186頁。

載，“沒有時間細緻經營”，在技巧上依然“守舊”，從而令作品“欠缺變化”。內容方面，則以平常瑣碎的“社會人生表象”為主，導致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生活“廣度不足”，“歷史感不夠厚重”，人與社會的衝突“揭示不深”，令澳門小說停留在“溫柔敦厚”的特性。^①筆者認為，湯梅笑與寂然的感觸是相同的，同樣指出小說發展的障礙因素。

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——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也是何香萍的學位著作。作者以小城的“青春題材”的作品為對象，企圖探討小說如何反映澳門回歸前後的社會面貌，以及如何“表現年輕人在挫敗與煩惱中探索美好人生”。^②何香萍認為，如同她討論林中英的《青春快板》一樣，這些“青春題材”小說所反映的學校精英教育以及單親家庭等問題，都是令人值得反思的題材，這也是該論文的研究價值之一。

結語

總括而言，近三十年的澳門華文小說的研究，主要以宏觀及微觀的論述為討論的方向。前者是以文學或小說發展作為概述，將當時出現的小說作者，乃至小說的出版著作，按照時間的順序陳列出來，然而勾勒出澳門小說的輪廓，後者則是針對小說的文本為討論對象。

從上文的爬梳整理，不難發現文學評論也不是零零落落的。特別對於小說的題材、表現手法及反思等批評的部分，依然出現在澳門文學的歷史河流裏。這樣的研究視角，無疑是讓讀者更容易掌握文本的中心思想，以及作者的個人風格及特色。

可是，人物和情節是小說的靈魂所在。倘若只是略為提及，而缺乏深刻的討論，這對於小說的研究，是難以有新的突破的。因此，筆者認為以微觀視角為討論的小說研究，仍是不足夠的。

小說文本的研究不足，也反映了文學評論的不足。從筆者的整理之下，研究作品看似不少，然而具有理論性或系統性的討論仍是欠缺。例如，以討論作者的寫作動機，乃至與社會的關連性方面的研究，筆者認為還有待加強。

寂然曾以小說家的角度去看澳門的小說發展，他期許澳門的小說，可以“發揮其應有的力量，讓此間的群眾能被本地小說感動，並且對澳門文學改觀，扭轉現時澳門小說平靜如水的局面，進而開拓文學市場，擴大澳門小說對外的影響”。^③筆者認同寂然的看法，作者和讀者也需要有書寫和閱讀小說的訓練，然而評論者也應具備這樣的能力，因為細膩的文本解析，是影響文學評論素質的首要條件。

正如香港作家何紫在〈從“澳門文學”談起〉中指出，若要讓澳門文學推上另一座高峯，首先應該要發展“研究評論”，給予“從事文學的人及作品應有的文學地位”。他也相信“澳門文學”要“人們給它做分析、研究、做定論，然後是產生各種重視的行動，各種獎勵計劃，乃至吸引更多人為文學獻身”。^④

① 湯梅笑：《澳門敘事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04年，第83頁。

② 何香萍：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——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，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02年。

③ 鄒家禮：〈澳門小說的未來——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186頁。

④ 何紫：〈從“澳門文學”談起〉，《澳門文學論集》，澳門：澳門文化學會，1988年，第101頁。

莊文永在評論廖子馨的《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》時，認為其不足之處恰巧在於“反思方面”，並指出研究者沒有把女性如何在澳門這獨特的社會環境裏，確立自己的“人生觀”及“價值觀”表現出來，以及在文學創作方面“所表現的是甚麼樣的人生態度，她們的視野期待、文化心理、審美風格”等，強調這些都是不能忽視的視角，都應該“從澳門特殊的文化背景去深入的思考，才能找到澳門現代女性文學的風格和特色，才能更好地確立澳門現代女性文學在澳門文學的家族中的獨特風采”。^①

其實，澳門的小說研究，乃至澳門的文學研究，也是應該朝着這些研究方向邁進。同時，正如韓牧在1980年代所提出的“建立文學形象”的口號，若作者及研究者不強調澳門文學的區域性，又何以建構屬於我們的澳門文學？而讀者又應如何接受？當地又應如何普及文學的教育？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

[特約編輯 張堂錡；責任編輯 陳超敏]

^① 莊文永：〈開拓研究澳門女性文學的疆域〉，李觀鼎編：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298頁。